

中国历史文化

王煜琴 主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主 编 王煜琴

副主编 党 轲 辛建萍

编 委 (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煜琴 王 维

石 磊 朱向群

李秀梅 辛建萍

赵清华 党 轲

前 言

旅游业的发展是以旅游资源的价值开发利用为前提的。中国悠久的历史,广袤的疆域,丰厚的文化积淀,铸就了中国旅游资源的丰富多彩,为今天旅游业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对于旅游业的发展,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能否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去正确认识和发掘旅游资源中的精华,古为今用;能否正确对待和分辨前人留下来的文化遗产,继往开来,是目前旅游从业人员面临的文化素质问题之一。

本书是为中等旅游专业学校导游专业及其它旅游专业编写的具有一定针对性的教材。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学生在历史文化常识方面的不足和缺陷;同时也为他们真正的认识了解旅游的本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本着学为致用的原则,各篇章的编写主要是针对与旅游专业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历史文化常识而展开的,故各章节内容详略不一,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文化”读本。

怎样从旅游专业的学习角度,来辩证地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精华,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更好的宣传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是目前摆在旅游教育者面前的一个新问题。本书试从这个角度作一个尝试,疏漏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由王煜琴同志任主编,党轲、辛建萍同志任副主编,参加编写的还有赵清华、王维、石磊、朱向群、李秀梅。

编 者

1999年6月

推荐一本好书

20年前,我应邀作为中国政府旅游代表团成员,访问、游览了文明古国埃及,并签订了中埃政府旅游协议。后,我们参观游览了举世闻名的古迹,像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卢克索神庙等等。大约是由于埃及旅游部的精心安排吧,在每个景点,我都遇到了出色的导游,后来我还专门撰文“我的埃及导游们”,介绍了他们的成功之处。

在阿斯旺的参观中,我又有幸见到大家公认的埃及最出色的导游哈桑·马斯赖先生。先生当年60余岁,是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平时稳重,但一要手持话筒导游起来,便活灵活现。他的导游内容丰富,形式活泼,知识趣味二者兼备,业务规范具佳……

机不可失,我抓紧学习机会,向这位导游前辈提了个问题:旅游工作者掌握知识是极为重要的,而知识又是多种多样的,您认为何种知识对旅游工作者第一重要?

“历史!”先生斩钉截铁地说,声音之干脆,回答之坚定,时至今日仍绕耳而响。

10年前,随着我国广大研究者对新兴旅游业的探讨,一些著名专家指出:旅游业是项文化性很强的经济事业,旅游业亦是项经济性很强的文化事业。看来,我们所从事的旅游业是同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了。

近年来,随着社会进步,综合素质的提高,人们出游目的从“看

热闹”向“看门道”转化……有的专家又提出旅游业的竞争,归根结底将是文化品牌的竞争;旅游产品价格高低,最终取决于产品文化内涵含量的多少。

一个“历史”,一个“文化”,看来,这是我们每一位旅游工作者,特别是第一线的推销和接待人员、导游人员所必须了解,必须学习,必须掌握的!

于是,多年来,我一直企盼着有一本谈论中国历史文化和旅游的书,它是我们旅游工作者极其需要的!

近来,由山东省旅游学校的王煜琴老师主编、党軻等共同编写的《中国历史文化》(旅游专业)即将出版,我多年的企盼得以实现,很是高兴。

本书作者非常谦恭,寄来书稿又写了封充满情义的书信。由于以上原故,又由于盛情难却,作者让我写几句话,我就欣然提笔了。

流阅全书后,感到有四个特点:即选材得当、论叙深刻、知识面广、实用性强。

一、选材得当

书中介绍和论述所涉及的知识 and 专题,如:历史、文化、民族、宗教、儒家学说、古建园林……都是旅游工作者经常遇到的,必须掌握的。特别是节日、民俗、风物、器物更是我们应当向游客介绍的。因为,当代游人出游之目的是“受教益,获知识,领略异地他乡情趣”。没有风俗,没有器物,特别是没有文化,这个“情趣”是产生不了的。所以此书选材是非常得当而需要的。

二、论述深刻

本书章节安排清晰,论述亦很深刻。每章每节,往往开始先对所论之题,综合各家之长,下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定义,也可称先让大家取得共识。然后,夹叙夹议,有理有据进行论述,而且还不时举出生动的例子,说明所论事物,这些举例不仅对论述有用,对读

者今后的实践也定会有用。

三、知识面广

几乎在旅游活动中遇到的所有知识均都涉及到了历史的、地理的、人文的、实物的……特别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儒家学说，很少有本有关旅游的书讲得这么深入、全面。该书之所以涉及的知识面这么广，是由作者写此书目的所致，“因导游教学及实践而深感导游从业人员在历史文化常识方面之不足而遂有编写该书之念。”导游的知识是广而杂的，此书正堪为用。

四、实用性强

大家知道旅游业是项实践性很强的行业，可喜的是此书也是实用性很强的书。书中有些内容甚至有“拿来就可用”之感。当然，此书不仅可实用，而且尚有“引导”读者进一步研究的作用。

但是，由于作者不是旅游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也未长期从事导游实践工作，所以书中有些问题研究尚欠深入，特别是历史、文化知识同导游实践相结合方面的论述也有不足之处，这些也正是今后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总之，这是一本好书，是本很值得学习的书。特别当前全国正宣传，施行国务院发布新的“导游人员管理条例”之际，此书出版更有意义。所以，我向全国 10 万余名导游人员，旅游工作人员，关心和学习旅游的各界人士推荐此书。

是为序。

研究员、教授、特级导游评委 王连义

目 录

第一章 总论	(1)
第一节 文化概说.....	(1)
第二节 中华民族.....	(3)
第三节 旅游与历史文化	(10)
第二章 儒家学说	(13)
第一节 儒学的发展	(13)
第二节 儒家的经典	(17)
第三节 十三经	(19)
第三章 宗教	(28)
第一节 佛教	(28)
第二节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33)
第三节 中国佛教宗派	(36)
第四节 中国佛教教徒和寺院管理制度	(46)
第五节 佛教中的崇拜对象	(53)
第六节 道教	(55)
第七节 基督教在中国	(66)
第八节 伊斯兰教在中国	(71)
第四章 中国的古建筑与园林	(80)
第一节 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简史	(81)
第二节 中国古建筑的主要特点	(86)

第三节	中国古都、宫殿、坛庙建筑	(96)
第四节	中国的宗教建筑	(108)
第五节	中国的石窟寺与摩崖造像	(118)
第六节	中国的陵墓建筑	(128)
第七节	中国的古代园林	(135)
第五章	中国古代艺术及器物	(169)
第一节	中国古代的书画艺术	(169)
第二节	中国古代的音乐艺术	(185)
第三节	中国古代石刻艺术及其它	(190)
第四节	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	(201)
第五节	中国古代的工艺器物	(212)
第六章	中国古代节日民俗与鬼神信仰	(231)
第一节	节日民俗	(231)
第二节	鬼神信仰	(245)
第七章	中国的风物特产	(249)
第一节	酒与茶	(249)
第二节	中药	(266)
第三节	文房四宝	(276)
第四节	盆景	(291)

第一章 总 论

自从人类能够直立行走,脱离了兽类,并在自觉意识支配下从事生产劳动,自然界就被赋予了人的意义,出现了反映人的意向和活动的世界,“文化”也就开始了它的生命运动。

第一节 文化概说

“文化”是一个中国古已有之的词汇,其概念内涵代有变迁,至近代吸收西方学术思想后,赋予了它新的涵义。实际上,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化内容在日益丰富,人们对文化的理解也不断向着广延度和深刻度发展。

“文”的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引申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进而具体化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修饰、人为加工,并进一步推衍为文德教化,以及文辞、文章等。“化”则有变,改、化生、化育、造化等意。归纳起来,“化”的含义是:二物相接,其一方或双方改变形态性质,由这层内涵引申为教行、教化,化而成之等意。“文”与“化”并联使用,最早见于《易·贲卦》的《象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句话用天象有规律可循(日月往来交错文饰于天,通过这种观象可以认识天的变化规律),比拟人伦也有规律可循(人类有文明礼仪则能止其所当止,观察人类社会生活的

这种现象就可以教化天下人走上正途)。这里的“文”从纹理意演化而来,“天文”指天道自然规律,“人文”指人伦社会规律,具体指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纵横交织的关系,如夫妇、父子、兄弟、朋友、君臣,构成复杂网络,具有纹理表象。因此,“人文”指人文序列。“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已接近于“以文教化”的表述方式。而“以文教化”(即以人伦秩序教化世人,使之自觉按规范行动),便是中国传统的“文化”一词的基本含义。西汉以后,“文化”正式作为专有名词使用,如刘向的《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指用体现道德政治伦序的诗书礼乐教化世人,与武力征服相对。

总之,中国古代的“文化”概念,基本属于精神文明(或狭义文化)范畴,大约指文治教化的总和。

在西方“文化”的对应词为拉丁文,其原形为动词,含有耕种、居住、练习、留心或注意、敬神等多重意义。16世纪、17世纪,英文和法文,逐渐由耕种引申为对树木禾苗的培养,并进而被指为对人类心灵、知识、情操、风尚的化育。其含义是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逐渐引向精神生产活动的。

“文化”作为一个内涵丰富的多维概念被众多学科探究、阐发,这主要是因其具有历时性的动态进程和共时性多样化的状貌的性质决定。各学科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给文化作出界说,导致其内涵和外延的不确定性,所以关于文化的定义近乎百余种。

如依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文化”一词加以阐释:文化是人们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在文化的创造和发展中,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而文化便是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在实践中的对立统一物。这里所谓的“自然”,不仅指存在于人身之外并与之对立的外在自然界,也指人类

的本能、人的身体的各种性质内在的自然性。文化的出发点是从事改造自然进而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着的人。人创造了文化,同样文化也创造了人。有意识的生产活动直接把人与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类化”,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价值经由符号这一介质在传播的实践过程;而这种实现过程包括外在的文化产品的创造和人身心智的塑造。简言之,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产品,都属于广义的文化;或者说“自然的人化”既是文化。人类通过有意识地活动(实践)改造了自然,使之适应人类的发展需要,同时人类也在不断地改变着自身的性质、自身的内在世界,诸如观念、情感、思想、能力等。

第二节 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是以华夏族(即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的共同体,其产生发展随历史的演进,民族融合日广,联系愈强,民族观念也愈加巩固;至20世纪初“中华民族”成为全体中国人的诸族之总称。

一、 中国

“中国”这一称谓,在周武王成王时,已出现,但在周代以前找不到任何记载,据于省吾教授考订:“商代甲骨文没有‘或’、‘国’二字。”至周初金文才出现“或”字与“国”字同用,是指城邑。不过商代已出现了中商、大邑商居于中称中土的记载,与周边诸侯居住的东南西北土之“方”相对举。至周武王和周成王时,“中国”一词始诞生。据《尚书》一书对周成王的追述:“皇天即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是指皇天将中国的土地与人民交给周武王治理。“中国”显然是指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汉书·地理志》谓:“昔周公营雒邑,以为在于土中,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师。”这里的“土中”

意即“中土”，若以周居于夏之西，商居于夏之东而论，处于伊洛平原的夏区称为“中国”或“中土”是最恰当不过了。可见，在西周初期出现的中国有三种含义：（一）指京师，即首都。如《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以“中国”与“京师”，“四方”与“四国”互称。《郑笺》：“中国，京师也。”在这里，国是都邑的同义词，中国即天子所居的城，以与四方诸侯对举；（二）商周封域，与远方相对。《大雅·荡》谓：“文王日咨，咨女殷商。女奭怨于中国，斂怨以为德。”又谓：“内燠于中国，覃及鬼方”。《毛传》：“燠，怒也。……鬼方，远方也。”《郑笺》：“此言时人忧于恶，虽有不醉尤怒也。”这是西周末，诗人引述周文王以殷商失德于中国，使中国怨怒，以至远方各族也怨怒的告诫，来警刺周厉王。《大雅·桑柔》：“天降丧乱，灭我立王。降此蠹贼，稼穡卒痒。哀恫中国，具赘卒荒，”也是以诗警制周厉王无道，天降丧乱，使周室丧失了立国之基。这些诗句都是以商周封域作为“中国”而与远方对举的。（三）专指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即最初的夏区。后来引申，周在克殷以前已称其中心地带为“区夏”，也就是夏区。至西周晚期，周边各族，尤其是西北与北方各族大举内徙，以至西周之际与春秋时期，在中原造成了各族交侵杂处的局面。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中国”一词又增加了两层含义：一即诸夏，即周所封诸侯或汉族居住地区和建立的国家。“诸夏”又称“诸华”或“华夏”连称。华夏与中国成为同义词。二是包括周边各族在内的地方，统称为“中国”。如晚周疆域就不仅仅局限于所封诸侯的“诸夏”。《左传》记鲁昭公九年（前533年）晋国梁丙率阴戎侵犯属于周王所有的潁，周景王使詹桓伯责备晋国，说：“我自有夏以后稷，魏、骀、芮、岐、华，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可见中国是包括周边各族在内的。

另外，在《左传》、《国语》等书中，与华夏或中国对举的则是“四

夷”或称“四裔”。即夷蛮戎狄。西周时“夷”“蛮”、“戎”、“狄”，还没有与中国配成东南西北中五方，那时是京师与四方诸侯对举。春秋时已有四夷的名称，盖指四方之夷。到战国，随着统一条件的成熟，从意识形态到地理划分都已打破诸侯疆界，形成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全国大一统的观念。如原来被视为戎蛮的秦楚两国，与三晋、燕、齐并列七雄，同称中国与华夏，而春秋时在黄河、淮河、长江流域与诸夏交往杂处的各族，此时已不少华化。夏、周出于羌，商出于夷，已是一个文化汇聚与夷夏各有一部分分化出来融合而成为华夏雏形的历史过程。战国时形成的中原三晋，东方齐鲁，南方楚，西方秦，北方燕等几个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无不是以当地华夏为核心，各自融化了夷、蛮、戎、狄一部分及其许多经济、文化因素而形成。因此，可以这样说，在华夏以形成稳定民族共同体的基础上，秦灭六国，统一中国是历史必然的结局。华夏民族共同体则是以黄河中下游东西两大集团交融汇聚形成的核心，由四方各族分化出一部分在河、淮、江、汉地区融合而成。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南北水田农业文化和旱地农业文化地区的统一与融合，同时也有许多来自西北北方游牧各部的人们来到中原融入华夏之中，对华夏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不仅起了催化作用，也添加新的血液和有活力的因素。因此，可以说中国是蛮夷戎狄共同缔造的。

中国疆域基础在秦汉基本奠定下来，以后经过多次由统一到分裂，再统一再分裂，经隋唐发展至元明清，终于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确立和巩固。历代王朝，不管是汉族还是其它少数民族为统治民族，其管辖的疆域或版图，均属“中国”范畴。如秦汉郡县制度建立后，人们把秦汉建立的中原王朝称为“中国”或“华夏”。无论作地域名称或族称，“中国”这一概念，仍与先秦传统用法相同，即与“四夷”对举。如“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匈奴、羯、氐、羌、鲜卑等族，先后建立过政权，而石勒、苻坚都曾统一中国北

部,据有“两京”(长安、洛阳),自居“中国皇帝”,反指东晋为“司马家儿”与“吴人”。北魏在中国建立稳定的封建王朝,以“中国”自称,指南朝为“岛夷”。东晋与南朝更是以“中华正统”自居,斥北方王朝为“戎狄”与“索虏”。总之,在南北朝时期,处于统治地位的各民族,无不自居为中国,于是原被称为“中国人”的主体民族,或称为晋人,或以当时朝代的编户齐民称之。再后来至辽和北宋,金与南宋,它们彼此都自称“中国”,都不承认对方为中国。即使是少数民族在边疆地区建号称王,也常以作为中国的一部分而自豪。这说明,“中国”是中原汉族和历代当政的少数民族共享的称号。“中国”的概念已有了包括各民族的含义。

中国古代所有朝代都不以中国为国名,但都以“中国”为通称。至晚明、清初西方传教士东来,他们均称明清两朝为“中华帝国”,简称即是“中国”。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订立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中国与外国划定边界的第一个近代主权国家的条约,签订这个条约的中国政府是清朝廷,但使用的国名是中国。这是以国际条约的形式第一次将“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专称。辛亥革命后,废除了封建专制制度,一家一姓的朝代国号也随之废除,于是定国名为“中华民国”,简称“中国”,这也是第一次在国家名称中使用“中国”两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仍作为简称。

由此可见,在中国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含义曾发生多次深刻的变化。概括而言:由专指中原发展为包括所有郡县,进而发展为包括所有边疆;由专指华夏(汉民族)发展为包括中国各民族;由中华大地的统称,发展作为主权国家的专称。

二、“华夏”

这一概念,在中国远古、上古时代各有不同的含义。最初是指

民族,即华夏族,为汉族的前身。后来经夏、商、周三代,与四周夷、蛮、戎、狄等民族的融合,而形成夏族体的雏形。但由于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是商王朝的主要民族,人们便把华夏作为中国的代称。商以后各代,“华夏”一直为“中国”的同义词加以运用。除了代表“中国”这一含义外,“华夏”还有一个地理文化上的内涵。

1. 华夏族体的形成发展史。华是指华夏,是汉族的前身,为中国远古最大部落集团之一,它包括黄帝、炎帝、颛顼(高阳)、舜(有虞氏)、祝融等族;夷即四周各民族,主要有夷、蛮、戎、狄等。华夏部落集团在夏商周三代或近于三代前期,大体都居住在黄河中下游,通常可分为东西两个体系。1934年,古史专家傅斯年教授撰《夷夏东西说》指出:“这两个体系,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

夏的来源,按孟子的见解是来自“西夷”,实则夏兴起于以嵩山为中心的颍水上游及伊洛平原,发展达于晋南汾水、涑水平原。按夏的区域与商周两部落兴起地区而言,夏居于商和周的中间。所称“西夷”,是相对商而言的。商的来源,据《诗经·商颂·玄鸟》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颂·长发》云:“有娥方将,帝立子生商”。这种以鸟为祖先来源的颂诗已为甲骨文献所证实。说明商属于以鸟为图腾的东夷部落集团中的一支。商的第一位父系祖先名契。商族的起源,一般认为在鲁西豫东北,在其发展中活动到今河北易县一带。另外,也有学者认为它起源于幽燕地区,至上甲微以后,南下发展于河济泰山之间,即今冀、鲁、豫接壤地区及泰山一带。周的起源,据《国语·周语上》记载:“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急夏之衰也,弃稷弗务;我先王不窾用失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据此,周是从山西南部西迁的一支夏人,兴起于戎狄之间。但按照《诗经·大雅》中《绵》、《大明》、《思齐》、《皇矣》、《文王有声》、《生民》及《周颂·天作》等篇记述,周族始祖母叫姜嫄,“姜”通“羌”已成定论,周人的祖先大概是从羌人中分化出来的一支。其

中第一位父系祖先名弃,称为后稷,活动于泾、渭上游。他的后世在与戎狄斗争中经过多次迁徙,才定居于渭水中下游岐山周原一带。商末成为商的诸侯。

上述夏、商、周三族祖先来源不同,分属东西两大部落集团,最先发展的地区各异,但三代文化、制度,差异性小而共同性大,至西周已融为一体,华夏族体已初具规模。并以中国最早的王朝夏作族称。可见,华夏民族的雏形是由夏商周三支不同的主要来源汇聚复合而成的民族共同体。

华夏族体形成后,由于它是中国早期王朝的主要民族,所以从商周以后,它就作为“中国”的代替称谓了。其实,“华”和“夏”也都分别是中国的代称。“华”的含义有三种:一说古代中原地区的人们,自认为自己居住在衣冠整齐华丽的文明之地,所以自称为“华”,《左传》孔颖达疏解:“中国……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一说“华”含有赤色之意。周朝人喜欢红色,把红颜色看作吉祥的象征,所以就自称作“华”;另一说,华是由我国古称华夏省简而来。可见,“华”作为“中国”代称,历史悠久。“夏”在古代有“大”的含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是大禹建立的夏王朝。《史记·夏本记》云:“禹封国号为夏”,后来人们就常用“夏”来称呼中国。可见“华”和“夏”均可作“中国”代称。合为“华夏”同样也作为“中国”代称。

2. 文化属性。华夏不仅是族称,而且具有地理与文化的概念。据上述,华夏是三个古部落集团而形成的民族复合体。其中,夏兴起与发展的豫西、晋南,周兴起与发展的渭水流域关中一带,是由仰韶文化东西两大类型发展为河南、陕西龙山文化的区域,而先商活动的河济泰山一带,更是典型龙山文化发展的地区。由此可见,夏商周兴起与发展的地区,都是在龙山文化兴起与发展的地区,其文化都是在龙山文化统一黄河中下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夏商周先世发展时期,这些地区的早期青铜文化共同性已大于

地区性差异,以至人们很难区分夏文化和商文化。表明华夏文化在中国远古时代是有代表性的文化主体形态。华夏作为一种文化体,从华夏的尊卑贵贱的观念可见一斑。孔颖达疏解:“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谓之华”。实则,“夏”训为“大”,“广居也”,是以住土木结构的大房子为特征,未必有傲视他族而自为尊大的意思。“华”则自居礼义文采,视他族为不知礼义的“野人”。这种华夏贵贱尊卑的观念,反映了在春秋时文化已成为它们之间最根本的区别。以后经过几千年的文化汇聚交融,形成了各民族共同的,灿烂的华夏文化。

三、“中华”

华夏先民最早生活在黄河流域,四裔环绕,故自称“中华”。“中”意即谓居四方之中,又有“以己为中”意,与“以人为外”相对立。“华”,本意是光辉、文采、精粹,用于族名,蕴涵着文化发达的意思。《唐律名例疏议释义》说:“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中华一词,大约在魏晋时出现,南北朝已普遍使用。《晋书·刘乔传》记载刘弘上表给晋惠帝,表文中有“今边陲无备豫之储,中华有杼轴之困。”《晋书·陈郡传》记载郡于东晋初上书给王导,说:“中华所以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这里以“中华”对“边陲”,是指郡县地区与全国而言。至南北朝时,裴松之在《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中评论说:“若使(亮)游步中华,骋其龙文”必不出曹操诸谋士之下。这里是以中华称中原地区。《魏书·韩显宗传》记载显宗上书魏孝文帝说:“自南伪相承,窃有淮北,欲擅中华之称”,说明取得了统治地位的“戎狄”,自居中华正统而斥江南朝廷为“南伪”了。总之,中华一词,是由中国与华夏二名复合而成,其含义在古代与中国一词相当,在许多场合是同义语。论地域主要是指中原地区,扩而大之,及于王朝直接管辖的郡县地区;论民族,一般指